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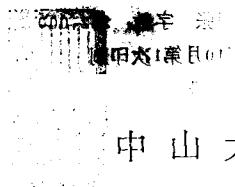
陈 锡祺 著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

中山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

陈 锡 祺 著



中山大学出版社

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

陈锡祺著

*

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海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大32开本 10,875印张 字数 400千字

1984年10月第1版 1984年10月第1次印制

印数：1—4,000册

书号：11339·1 定价：1.50元

目 录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1)
关于孙中山的大学时代.....	(35)
孙中山革命思想的产生和革命事业的开始.....	(65)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斗争.....	(83)
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之役.....	(99)
孙中山为创建共和国而斗争的伟大功勋.....	(115)
论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的活动.....	(153)
孙中山与国民党“一大”.....	(172)
国民党改组前后的廖仲恺与孙中山.....	(193)
太平天国与辛亥革命.....	(215)
关于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	(238)
孙中山与广东.....	(256)
纪念中山先生，向中山先生学习.....	(268)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提高研究孙中山的水平	(274)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281)
建国以来孙中山研究述评.....	(309)
后记.....	(342)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

孙中山是近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是为我们祖国的独立和自由而奋斗终生的战士”^①。为了改造中国，他付出了全部心力；领导辛亥革命，则是他一生中最富意义最有影响的丰功伟绩。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伟大的革命，它不但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朝政府，还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虽然这个共和国只是昙花一现，但它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觉悟，推动了民主精神的高涨，成为中国政治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孙中山和辛亥革命是紧密联系互相渗透的两大历史课题。研究孙中山就不能不研究他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也不能不了解孙中山的思想和活动。因此，探究一下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关系，对于研究这两大历史课题，都是必要的。

早在十九世纪末，孙中山即成为世界注目的人物。辛亥革命爆发，孙中山当选为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共和国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更成为轰动世界的新闻人物。有关孙中山的著述，愈来愈多，但其中大部分，不是神化式的宣传，即是歪曲、伪造，借用孙中山的名义，欺骗群众，为其各式各样的反动政治目的服

^① 周恩来：《在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幕词》。

务。解放后，随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发展，世界出现研究新中国的热潮，而且追溯它的历史，孙中山和辛亥革命也成为国际学者乐于探究的课题。在搜求资料、专题研究方面，深度广度，都有所发展。这种现象，值得欢迎。但有的人却认为，在辛亥革命的研究中，强调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作用，就是“新孙中心观”，或“新正统观”。这是很值得注意的问题。

有些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影响的同志，也常常有意贬低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认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三大革命高潮，辛亥革命的地位最低，因为太平天国革命和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领导的，所以要重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所以居于次要地位。这不仅是对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估价问题，而且是怎样正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说明社会发展规律的问题。

我认为讨论一下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关系，明确辛亥革命的重大历史意义和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丰功伟绩，对进一步提高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水平，繁荣历史科学，是有益的。

—

辛亥革命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所有革命。首先，它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领导的。其次，它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不同，它不仅要求推翻反动的封建统治，而且要建立一个没有皇帝专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第三，在革命胜利之后，它要求全力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赶超欧美。这是以往的农民起义所不能想象的。这种反对帝制、建立民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思想，首先提出这种思想的是孙中山。我们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首先是思想领导。

辛亥革命的纲领，就是同盟会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

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早在一九〇三年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而反对卖国的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则早在十九世纪末兴中会成立时，即已形成。一九〇五年，同盟会成立，全部接受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又归纳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他和黄兴、章炳麟共同修改的同盟会宣言中，明确提出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申明“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这就把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思想明确地规定下来。经过革命派的广泛宣传，共和国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宣布独立各省，“一律承认共和国体”。孙中山回国三天以后，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再过两天，新的共和国就在南京宣布诞生了。正如周恩来同志指出，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人民中散播了民主共和国思想的种子”①。

民主共和国的思想种子之所以能在中国人民中日益广泛地传播，也是从斗争中赢得的。孙中山则是和中国改良派划清思想界限，坚决与之斗争的第一个人。

一九〇〇年以前，孙中山为扩大革命力量，曾争取改良派，准备和他们合作。没想到改良派“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②。一九〇〇年后，孙中山和改良派展开了不调和的斗争。一九〇二年，正在日本东京的章太炎感喟地说：“吾不敢谓支那大计，在孙、梁二人掌中，而一线生机，惟此二子可望。今复交构，能无喟然！”③可以看出，最早认清改良派的反动嘴脸，立即和他们斗争的，不是别人，正是孙中山。

① 周恩来：《孙中山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开会词》。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六 版，第173页。

③ 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163页。

一九〇三年，章太炎在《苏报》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曾轰动一时；但章文只驳康有为颂清以及反对革命的谬论，对改良派的危害性、革命和改良“势不两立”的严重情况，缺少评论。同年，孙中山到檀香山，改组《隆记报》，亲自撰文和改良派斗争。他公开揭露改良派“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宣传，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①，旗帜何等鲜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弟刻在檀岛与保皇党大战，……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号召革命派同志“竭力大击保皇毒焰于各地”^②。他下决心和改良派战斗到底。一九〇四年，孙中山到美国，几乎无日不在和改良派“苦战之中”，“以图扫灭在美国之保党”^③。

孙中山这种把革命和改良视作“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非铲除不可的鲜明而坚决的态度，达到了同时期的革命家所未达到的水平，显示了一个民主革命先行者的高度思想觉悟。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更加意气风发地领导革命派，对日益疯狂反对革命的改良派，展开尖锐的斗争，使民主革命思想日益广泛传播。

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间，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在孙中山的直接领导下，制订对改良派辩驳的纲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与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展开长期的连续的全面大论战。在《民报》影响下，散布在各地的革命报刊，也纷纷投入战斗，形成了思想战线上的一次大辩论。

孙中山在这段期间所写的《〈民报〉发刊词》和演讲，全面地阐释了三民主义，有力地驳斥了改良派对同盟会及其纲领的污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52—53页。

② 《国父全集》第三册，台北一九七三年版，第31页。

③ 同上书，第32页。

蔑和攻击，成为革命派与改良派斗争的犀利武器。在《民报》上刊载的重要论战文章，不少是出自孙中山口授，或根据其授意写的①。这些文章列举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清朝政府投降卖国残虐人民的罪行，指出清朝政府的存在，是中国贫穷落后不能独立的根源，只有用革命的力量推翻清政府的“野蛮专制政体”，建立民主共和的民国，实行社会革命，才能使中国避免瓜分，走上独立自由富强昌盛的道路；而改良派千方百计为清政府的反动统治辩护，说明改良派爱国是假，爱清是真。清政府是帝国主义走狗，改良派为它辩护，实际上也是为帝国主义辩护。

从一九〇五年底到一九〇七年初，经过一年多的战斗，革命派虽然在对待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和劳动人民等问题上，出于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没有作出圆满的回答。但是革命派对改良派的论战，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孙中山和同盟会在群众中威信越来越高，革命思想在群众中“一唱百和，如饮狂泉”，反动官僚端方在给清政府的奏报中惊呼：

“逆贼孙文演说，环听辄以数千，革命党报发行购阅，数逾数万……入会之人，日以百计”②，可谓极一时之盛矣。革命派在这场论战中，洗涤了改良派在群众中散播的毒素，夺取了思想战线上的领导权。《新民丛报》为此曾发出哀鸣，慨叹：“数年以来，革命论盛行于国中。今则得法理论、政治论以为之羽翼，其旗帜益鲜明，其壁垒益森严，其势力益磅礴而郁积，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而身行破坏”③。

一九〇六年十二月，《民报》举行创刊周年庆祝大会，到会人数超过五千，是日本留学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盛会，也是一次革

① 《胡汉民自传》，见《革命文献》第三辑，台北一九五三年版，第16—17页。

② 《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资料丛刊）（四），第41页。

③ 《新民丛报》第九十二期。

命派力量的大检阅、大示威。

震慑于革命派的节节胜利，改良派一面气急败坏地督促其羽翼加紧活动，“大举以谋进取”，一面摆出求和架势，于一九〇七年初，派徐应奎（即徐佛苏）找宋教仁疏通，要求《民报》准许“调和”，今后双方“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当时章太炎一口答应“可以许其调和”，宋教仁事实上也是同意的。但孙中山对改良派的两面派手法，早有认识，坚持论战到底①，及时制止了同盟会内部的妥协倾向，在斗争中，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继续深入。

一九〇七年三月，孙中山被日本政府迫令出境，转赴南洋活动。次年十月，《民报》又被日本政府无理封禁。于是，革命派和保皇党的重要骨干陆续南移，南洋成了两派激烈争夺的重要地盘。当时，孙中山直接领导《中兴日报》，对当地保皇党喉舌《总汇报》进行论战。孙中山以“南洋小学生”名义，亲自撰写了论战文章。这场论战挫败了南洋的保皇势力，扩大了革命派在南洋的阵地，促进了华侨的革命觉醒，对当时的斗争起了直接的配合与支援作用。一九〇九年后的，由于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勾结破坏，革命派在南洋的活动受到限制，孙中山又被迫转往美洲。他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然孜孜不倦地宣传革命主张，揭露保皇党，使民主革命思想在美洲华侨中广为传播，华侨群众纷纷挣脱保皇思想的牢笼，转向革命，有力地支援了辛亥广州“三·二九”之役。

上述斗争清楚表明：孙中山在近代中国最早提出了民主革命思想，并在对改良派的尖锐斗争中，坚决捍卫这一思想，显示了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他在宣传和捍卫民主革命思想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夺回了曾经

① 宋教仁：《宋渔父日记》，见《建国月刊》第十卷第三期。

为改良派占领了的思想阵地，有力地促进了群众革命情绪的高涨，为辛亥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

二

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带有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资产阶级政党形式来组织领导的革命。这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是孙中山最早倡议建立的。孙中山从走上革命道路的第一天起，就着手组织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提出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纲领，并组织和领导了两次武装起义。正由于有了这个革命小团体的存在和活动，人们才确知孙中山代表着中国资产阶级中下层，正式走上反清的革命道路。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从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和义和团运动的被镇压中逐步觉醒起来，抛弃改良主义的幻想，走向孙中山的旗帜之下。一八九七年，章太炎从外国报纸上得知驻伦敦清使馆“有逮捕孙逸仙事”，即问梁启超，孙中山是什么样的人，梁说：“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章太炎即“心甚壮之”^①，从此就时时注意孙中山的行踪和言论行事。到一九〇二年，经过几次接触，章终于和孙中山“定交”^②。在黄中黄译的《孙逸仙》一书序词中，竟将孙中山比之赤帝子刘邦，说他“掩迹郑、洪为民辟”。意即孙中山继承了郑成功、洪秀全的事业，成为人民的领袖。黄中黄在书的自序中，开头即说：“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③。此书出版后，国内有更多的知识分子，归心孙中山。据张难先《湖北革命

① 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见《制言》半月刊第二十五期。

② 《太炎先生自订年谱》，见《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

③ 《辛亥革命》资料丛刊（一），第90页。

知之录》记载，“热烈之志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象，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此实当日普遍之情形”①。一九〇四年，湖北派往欧洲留学的朱和中等，就是想“今往西洋，正可乘机访孙逸仙”②。

经过一九〇三年革命浪潮的震荡，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趋向革命的越来越多，孙中山的爱国热忱，革命主张，坚持战斗的不屈意志，在群众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不到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已成为公认的领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③。而兴中会的成立，则是这一革命征程的伟大起点。

有人说兴中会是地方性的组织。从它活动的地区来说，限于广东和华侨聚居的夏威夷等地；从会员来说，当时几乎全都是广东人，但兴中会并不排斥广东以外的人参加。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失败以后，兴中会也在海外许多地方吸收了会员，成立了分会。一八九九年，兴中会会员史坚如曾随日人平山周深入长江内地，直到湖北、湖南，联络会党。随后在香港组织的“兴汉会”，则是把广东三合会、长江哥老会和兴中会合成一团。这一年前后，原来属于康、梁系统的人渐渐倾向孙中山，如湖南的毕永年、秦力山，浙江的沈翔云，湖北的吴禄贞，都参加了兴中会。香港兴中会宣言宣布兴中会宗旨：“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④。“无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心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⑤。可见兴中

① 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3页。

② 同上书，第106页。

③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第527页。

④ 《国父全集》第一册，第757页。

⑤ 同上书，第758页。

会一开始就明订宗旨，以世界为活动范围，后来发展的事实，也正是如此。

不过，有一种现象，倒值得我们注意。即一九〇三年以后，兴中会极少收揽会员，只是一九〇三年在檀香山、一九〇四年在旧金山吸收会员三十多人①。我认为一九〇〇年以后，孙中山发展党员的数量较少，是吸取过去失败的教训，注意党员的质量。一九〇三年，孙中山在日本托廖仲恺、何香凝等“物色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②。两年后，孙中山在同盟会成立前夕，找宋教仁、陈天华等谈话，纵谈当时大势及革命方法，对两广会党起义，一方面肯定他们的破坏能力，“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一方面指出他们缺乏领导人才，“无一稍可有为之人以主持之”。他认为：“一切破坏之前之建设，破坏之后之建设，种种方面，件件事情，皆有人以任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③。所以，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发展党员很慎重，既不断物色人才，又不轻易吸收入会。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〇三年，孙中山在日本接触到相当多的留学生，和章太炎就是在这时候“定交”的，可是就没有吸收章入党。一九〇三年，对廖仲恺、何香凝也如此。孙中山曾对知识分子不很信任，但到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在一九〇三年拒俄反法运动以后，知识分子日益趋向革命，在和反动势力的斗争中，英勇顽强，发挥了很大的力量，《苏报》案就是一个例子。孙中山对知识分子的作用日益重视，对邹容的《革命军》备致赞扬，认为“为力甚大”。在檀香山，改兴中会为“中华革命军”，就是为了纪念邹容写的《革命军》。一九〇三年十二月十七日，孙中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三集，第32页。

②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5页

③ 宋教仁：《宋渔父日记》。

山在致友人书中称：“弟今在檀香山已将向时党字改为军字，今后同志当自称为军，所以记□□（应为邹容）之功也”①。一九〇四年冬孙中山在欧洲，曾与朱和中辩论，朱建议多争取知识分子，他即“深以为然”。一九〇五年，他回到东京后，就立即找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的骨干商谈，组织全国性的革命组织。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一心一意想“拯斯民于水火，扶大厦之将倾”，推翻腐败的清朝政府，建立近代化的民主共和国。为此必须有众多的进行革命和建设的人材。孙中山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九〇三年以后，孙中山在充分研究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社会经济情况，结合中国的具体条件，将兴中会纲领修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从青山军事学校誓约、檀香山“中华革命军”誓词、美洲致公堂新章、欧洲留学生革命团体的盟书，到同盟会的会纲和誓约，都是这十六个字。致公堂新章第四条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堂相同者，本堂当认作益友，互相提携；其宗旨与本堂相反者，本堂当视为公敌，不得附和”②。中国同盟会总章第五条也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③。可见一九〇三年以后，孙中山十分重视革命宗旨的制订，对于组织名称，可以因时、因地、因事不同而有所改变。但宗旨未变，仍可视为同一组织。所以东京青山军事学校、檀香山中华革命军和欧洲留学生革命团体等，不但革命宗旨相同，而且所拥戴的领袖都是孙中山，应该仍是兴中会，关于旅欧留学生的革命团体的名称，虽众

① 《国父全集》第三册，第30页。

② 同上书，第887页。

③ 同上书，第897页。

说纷纭，但当时在英国加盟的吴稚晖则认为“在欧洲所开之三会，仍名兴中会也”①。多少年来，大家一致认为同盟会是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而成，孙中山是代表兴中会的。如果兴中会已不存在，或孙中山不愿代表兴中会，则孙中山当日又是代表什么力量和华兴会等革命团体联合呢？事实上，一九一〇年四月前，檀香山的革命组织仍称兴中会②。

有人说，同盟会成立时，华兴会势力远在兴中会之上，因而在同盟会的黄金时代，华兴会起了主导作用。其实并非如此。就海外的关系说，孙中山代表的兴中会早已植根于华侨之中，无论是在欧、美、南洋，还是在檀香山，孙中山都有了联络，建立了据点（如在香港有《中国日报》，檀香山有《檀山新报》，旧金山有《大同日报》，南洋有《图南日报》，在欧洲则有比、德、法等留学生革命团体），所以华兴会成员在讨论华兴会和孙中山联合的问题时都提“入孙逸仙会”或“不入孙会”③。当时在东京的留学生中，华兴会的势力是比较大的，活动能力也是比较强的，他们之所以如此重视和信服孙中山，这和孙中山在群众中已经确立起来的领袖地位以及他代表的力量，是分不开的。所以同盟会成立，孙中山即被公举为总理，同盟会的会纲则一字不改地采用孙中山为兴中会所修订的十六字宗旨。

以上事实，说明兴中会和同盟会有血肉联系，同盟会的成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可说是中国民主革命高潮到来的标志。这和孙中山的领导是分不开的，而孙中山当日依靠的力量基础又是和散布在各地的兴中会势力分不开的。

①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一册，第43页。

② 冯自由：《华侨革命开国史》，第37—38页。

③ 宋教仁：《宋渔父日记》。

有的同志说，孙中山在一九〇〇年惠州起义失败以后，即开始认识到兴中会不再适应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即把宣传组织工作的重点，从海外的华侨、会党逐渐转向到在日本、欧洲留学的知识分子身上，就是要把各地革命力量连结起来，并且在这种基础上建立全国性的革命政党。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关于组党的思想确已发生变化。我同意说孙中山在一九〇三年以后在群众中进行的宣传组织活动，不是为了恢复和发展兴中会，而是为建立更大的包括全国革命力量的团体。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仍相信会党是重要的依靠力量。为了能深入群众之中，同改良派争夺群众，一九〇四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致公堂，到美国后，帮助致公堂实行全美洪门会会员总注册，重订新章，表示他对会党还有很大兴趣。一九〇四年冬，他与朱和中辩论时，还以“借会党暴动为可靠”^①。同盟会成立最初的两三年，不管是萍、浏、醴起义，还是潮州、黄冈起义，惠州起义，基本上都是策划会党发动的起义。一九二三年一月，孙中山在写《中国革命史》，总结辛亥革命前的起义经验时认为，“慷慨助饷，多为华侨；热心宣传，多为学界；冲锋破敌，则在军队与会党”^②，也就是说，孙中山晚年，肯定了华侨、知识分子、会党和新军都“各尽所能”，贡献了力量。孙中山对知识分子发生兴趣，吸收他们入党，开始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〇四年冬，才大量争取知识分子入党。一九〇五年八月，孙中山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演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③。留学生、知识分子应该属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说明过去孙中山着

① 《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5页。

② 《国父全集》第三册，第186页。

③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65页。

重信赖会党，争取会党，这是由于他对会党的认识，也是由于会党对他的反清革命主张能“应而和之”。知识分子参加革命的，可说是“寥寥”，所以孙中山就产生了“秀才不能造反”的观点，不轻易在知识分子中吸收党员。

一九〇五年，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留学界的思想面貌已经大变，“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同盟会组成后，孙中山非常兴奋。他说：“自革命同盟会成立之后，予之希望则为之开一新纪元”。过去虽身当百难，屡败屡战，冒险猛进不已，“仍未敢望革命排满事业能及吾身而成者也。其所以百折不回者，不过欲有以振起既死之人心，昭苏将尽之国魂，期有继我而起者成之耳”。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认为这是集全国之英俊而成立的，他相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①。

适乎时代的潮流，合乎群众的愿望和革命的需要，在孙中山等人的活动下，联合全国重要革命团体的同盟会产生了。这对中国的民主革命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说辛亥革命是孙中山领导的，那么，孙中山就是通过他领导的党——同盟会实行领导的。

一九〇五年成立的同盟会和以往的革命小团体有很大不同。第一，它是真正统一的全国性的革命组织，本部十八省，除甘肃外，都有代表参加。第二，它是仿照西方资产阶级政党型式建立起来的新型革命党，按三权分立原则设立机构，总理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四年更选一次，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第三，它有公举的领袖，有明确的党章、党纲和其它各种规定。第四，它是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团体。这就使它区别于以往的任何一个革命团体。但我认为不能把它和兴中会截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6页。